

序 言

日本作为现代国家的兴起令人震惊：更迅猛、更无畏、更成功，然而最终也比任何人能够想象的更疯狂、更危险、更具有自我毁灭性。回想起来，这简直就像是某种错觉——一场九十三年的梦想，演变成了由美国军舰引发和终结的噩梦。1853年，一支四艘军舰的不起眼的美国舰队（其中两艘是蒸汽动力的“黑船”）抵达日本，强迫日本实行开放；1945年，一支庞大的、耀武扬威的美式“无敌舰队”再次来临，迫使日本关起大门。

当年美国海军准将马修·佩里（Matthew Perry）抵达之时，日本不过是一个资源较为贫瘠的小国。二百年间，日本与外国的交往，在很大程度上一直被封建幕府将军所禁止。尽管在漫长的闭关锁国期间，日本经济在商业化方面已经很是发达，但是日本并未发生工业化革命，在科学领域也没有任何显著的进展。纵使欧美人发现这些岛民既具异国风情又聪明能干，然而没有谁会像拿破仑评价日本的邻邦中国那样评价它，前者因为广袤的疆土、众多的人口和数千年高度发达的文明，被誉为一头“沉睡的雄狮”。

1868年，持不同政见的武士们驱逐了幕府将军，建立了以天皇为首的新政府，而此前天皇一直是个高高在上、缺乏实权的角色。事实证明，他们新的民族国家进步很快，不仅学习现代和平时期的统治艺术，而且学习现代的战争技术，尤其善于领悟在一个帝国主义世界中的生存法则。正如1880年代流行的一首日本歌曲的歌词：“国家之间有法则，这是真的，但当时机来临，请记住，弱肉强食。”¹ 当世界的大部分区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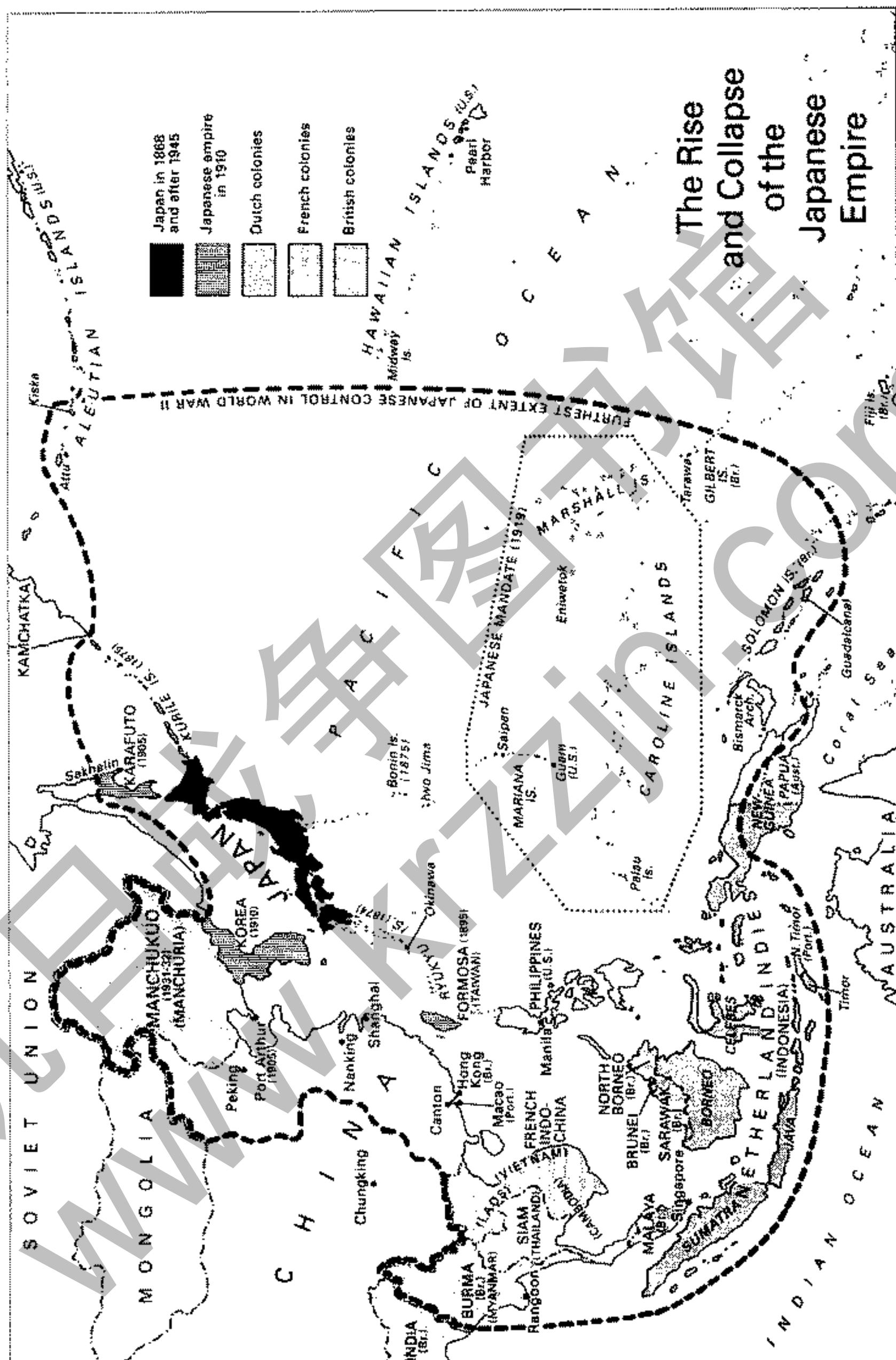
处于西方列强支配之下时候，日本起而效仿西方诸国，并加入了他们的行列。1895年，日本帝国的陆海军迫使中国俯首称臣。日本在亚洲大陆取得的这一决定性胜利，使中国背负了沉重的赔款负担，也加剧了从这头“睡狮”身上割取外国租借地的狂潮。这就是西方人士津津乐道的“瓜分中国”。

战争为日本帝国带来了第一块殖民地——中国台湾岛。十年后，在一系列代价高昂的陆地战和一次大获全胜的海上战役之后，日本对沙皇俄国的胜利，则为它带来了国际公认的在满洲的合法地位，并铺平了获取朝鲜作为第二块殖民地的道路。为筹措对朝战争的经费，日本在纽约和伦敦的贷款大增，而西方列强也对朝鲜爱国志士的呼吁装聋作哑。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加入了同盟国的敌对方，侵夺了德国的在华利益，并成为凡尔赛和约的五大战胜国之一。正是在这次会议上，胜利者们聚集一堂以惩办德国并重整世界秩序。当时任何其他非白人的、非基督教的国家，都难以想象能有资格忝列这种世界强国间的游戏，并在如此高端的层次上产生影响；诚然，也没有人能够预见到和平安定局面的土崩瓦解就在眼前，毕竟在当时看来，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为了结束所有的战争而战。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当世界陷入经济萧条和动荡的恐慌中时，日本的领导者以越来越狂热的对亚洲市场和资源的支配欲望，回应并加剧了这种混乱无序。“大日本帝国”的版图像一摊污迹一样蔓延开来（在日本制地图上，日本帝国的版图总是以红色标示）：1931年接管满洲，1937年全面发动对华战争，1941年，作为控制亚洲南部与太平洋地区战略的一部分，袭击了珍珠港。到1942年春天，日本帝国已处于版图扩张的巅峰时期，像一个巨人凌驾于亚洲之上，一足植于中部太平洋，一足深入中国腹地，野心勃勃地向北一直染指到阿留申群岛，向南则直取东南亚的那些西方殖民飞地。日本的“大东亚共荣圈”，大致环抱了荷属

22 东印度群岛、法属印度支那、英国殖民领地缅甸、马来亚和香港，以及美国殖民地菲律宾，甚至号称要进一步将印度、澳大利亚，甚至夏威夷纳入囊中。欢呼天皇“圣战”光荣和他忠诚的陆海军勇士天下无敌的万岁声，在日本本土及海外的无数地方响彻云霄。诗人、僧侣和宣传家们都齐声颂扬“大和民族”的优秀与王道的神圣天命。

The Rise and Collapse of the Japanese Empire



然而，“大东亚共荣圈”不过是一种狂想，日本人在太平洋战争头半年的幸福幻觉不过是南柯一梦，很快就被自己“胜利的弊病”抵消殆尽。他们已经失去节制，在心理上和物质上都严重低估了中国人民抗战的生命力和资源，并从此陷入与美国的长期战争之中。同时他们已经成为自己的战争说辞的奴隶，为所谓“圣战”疲于奔命，盲目信奉“要死于蒙受耻辱之前”，“战死者的血债需血来偿还”，“以天皇为核心的国体神圣不可侵犯”，“马上就会有一场决定性的战役扭转局势，击败‘中国强盗’并且阻止‘鬼畜美英’”等等。直到日本的失败命运已经昭然若揭，它的领袖人物还在尽全力说服天皇，坚持不考虑投降。他们已经冥顽不化，只能跌跌撞撞地一意孤行。

美国人以他们向来忽略历史不易解释的复杂之处的有趣习惯，对诸如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与全球经济的破坏等统统视而不见，声称是佩里把魔鬼放出了瓶子，而那个魔鬼已经变成了一个鲜血浸透的怪物。从战争起初几个月在中国的南京大屠杀，到太平洋战争末期的马尼拉大屠杀，日本帝国的陆海军士兵们留下了罄竹难书的残忍与贪婪的斑斑劣迹。事实证明，这也导致了他们的自我毁灭：日本兵死于绝望的自杀式冲锋，饿死在战场上，为不当俘虏而杀死受伤的士兵，并在塞班岛、冲绳等地残杀自己的平民同胞。他们无望地看着燃烧弹烧毁他们的城市，却一直在听任他们的领袖喋喋不休地瞎扯什么“一亿玉碎”的必要性。“大东亚共荣圈”最显而易见的遗迹，只有死亡和毁灭。在中国一地，死者大约有 1500 万。而日本也损失了近 300 万人口，并失去了他们的整个日本帝国。

在这场可怕的风暴过后，日本进入了一种奇怪的隔离状态。

它再次从世界舞台上隐退——不是自愿地，而是在胜利者的命令之下；同时也不是孤独的——像佩里进入之前的时代那样，而是被幽闭在了美国征服者那近乎肉欲的拥抱之中。而且，时隔不久就显现出，美国人既不能也不想放手。始于珍珠港袭击，终于广岛、长崎原子弹爆炸后日本签订投降条约，日本和同盟国的这场战争持续了三年零八个月；而对战败国日本的占领，则开始于 1945 年 8 月，结束于 1952 年 4 月，共计六年零八个月，时间几乎是战争时期的两倍。在被占领的年代，日本没有国家主权也就没有什么外交关系。几乎直到占领期结束，日本人不

被允许出国旅行；未经占领者许可，进行任何主要的政治、行政或经济上的决策都是不可能的；任何对美国政体的公开批评都是不容许的，纵然最终持不同政见者的声音已经难以压制。

起初，美国人强加于日本的是一整套彻底的非军事化与民主化构想，从任何方面来讲都是一种傲慢自大的理想主义的显著表现——既自以为是，又异想天开。后来，当离开日本之前，他们又完全逆转过来，与日本社会中的守旧势力合作，重新武装他们昔日的敌人，使之成为从属的冷战伙伴。尽管日本战后最终以一个保守国家的面目出现，然而和平与民主的理念已然在日本落地生根——不是作为假借的意识形态或强加的幻象，而是成为一种生命的体验与牢牢掌握的契机。它们经由众多的、经常是不协调的差异性声音表达出来。

日美之间的这种关系是史无前例的，而战后任何其他的经验也无法真正与之相比。德国，日本从前的轴心国伙伴，在被占时期由美国、英国、法国和苏联分而治之，缺乏像美国对日本进行单边控制那样高度集中的关注。而且德国逃脱了东京投降后的当权人物——道格拉斯·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将军那救世主式的高涨的热情。对于胜利者来说，占领战败的德国，也不能感受到在日本的异国情调，那完全是一种对异教徒的降伏。毫无疑问，在麦克阿瑟将军看来，是领受基督使命的白人拯救了“东方”社会。对日本的占领，是殖民主义者妄自尊大的“白人的义务”之最后的履行。²

很难找到另外一个两种文化交汇的历史时刻，比这更强烈、更不可预知、更暧昧不明、更使人迷惑和令人兴奋了。许多美国人，当他们到来的时候，做好了心理准备将面对狂热的天皇崇拜者所带来的不快。但当第一批全副武装的美军士兵登陆之时，欢呼的日本妇女向他们热情召唤，而男人们鞠躬如也地殷勤询问征服者的需求。他们发现自己不仅被优雅的赠仪和娱乐所包围，也被礼貌的举止所诱惑和吸引，大大超出了他们自身所察觉的程度。尤其是他们所遇到的日本民众，厌倦战争、蔑视曾给自身带来灾难的军国主义分子，同时几乎被这片被毁的土地上的现实困境所压垮。事实证明，最重要的是，战败者既希望忘记过去又想要超越以往。

可以理解，战后的头几年曾被肯定性地描述为日本的“美国式插

曲”，或者按照否定的说法，那是一个不寻常的野蛮加强迫的“美国化”时期。无论何种描述，通常强调的是美国的意志强迫性地施加于一片异国的土地。是胜者而非败者，对这一刻具有决定权。胜利者们获得了关注的目光，正像他们开始控制战争主动权的时候一样。在绝大多数场合，占领者与他们的构想总是至高无上，与此相反，被征服的国家却被置于战后分裂敌对的冷战氛围之中，显而易见必须依照美式逻辑来讨论问题。曾经强大的对手变得渺小了，被打败的人民成了新的世界舞台边缘的影子角色。

这样的叙事并不使人感到意外。同盟国方面的胜利是如此巨大，从而使日本仅仅作为胜利果实被关注，这故事看起来似乎毫不费解。1945年8月底，当时仍然处于所谓“美国新纪元”的开幕阶段。历史以一种独特的占领方式，带着强制的、远大的构想逼近了日本这片荒废的、忏悔的土地，而世界正在朝着令人担忧的新的方向飞驰。关于这个被完全打败的、意志消沉的国家，还有什么比胜利者的占领更重要的事值得一提呢？对记者们以及后来的历史学家们而言，美国人将会对日本人做什么，才是故事最引人入胜之处。直到近来，想象占领是一种双方的“拥抱”仍然是困难的，而推测失败者可能对胜利者和他们的构想产生过影响、“美国式插曲”可能加强了而不是改变了战败国国内的趋势，依然是困难的。对于外人来说，想要领会作为日本人生命体验的战败和被占领，自然是十分不容易的事。

然而半个世纪过后，我们可以开始以不同的方式看待这个问题。满目疮痍的国土、颠沛流离的人民、衰亡没落的帝国与支离破碎的梦想，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核心叙事之一。当然，我们从战败者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将会学到更多：不仅是悲惨、迷茫、悲观和怨恨，还有希望、韧性、远见与梦想。与大多数历史论著、包括我个人早期的著述采取的研究方式有所不同，在下面的章节里，我试图“从内部”传达一些对于日本战败经验的认识，不仅仅是借助于聚焦社会和文化的发展，更有赖于关注这一进程中最难捕捉的现象——“民众意识”。³换句话说，我试图通过还原社会各个阶层民众的声音获取一种认知，即：在一个毁灭的世界里重新开始，到底意味着什么。对日本人而言，直到1952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才真正结束，而战争年代、战败以及被占领时期，给亲历

者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迹。无论这个国家后来变得多么富裕，多年来，这些留存的记忆，已经成为他们思考国家历史与个人价值观的重要参照。

尽管我们总期望简化研究对象和问题，但是除却普遍的对战争的痛恨情绪而外，并没有什么纯粹的或单一的“日本式”的战败反应。相反，使人着迷的正是这些反应如此五花八门、多姿多彩。这与华盛顿和伦敦那些“亚洲事务的老手们”的预期实在相去甚远。他们固守着自己对于“东方人”的成见，认为他们实质上是一群“顺从的羔羊”。胜利者们抵达之时，怀揣着概括“日本人个性”突出特征的剪报，其中有些特征观察入微，而许多概括不过是漫画而已。反过来，日本的情报部门也正拿着他们自己的“美国人性格”清单在守株待兔。⁴然而，他们双方中的任何人也不曾料到，对于战败、从战争以及战时管制中解放出来的反应，是如此千差万别而又生机勃勃。由于战败如此彻底、投降如此地无条件、军国主义分子如此地臭名昭著、“圣战”给家庭带来的不幸如此深具切肤之痛，重新开始，就不仅包括重建地面上的建筑，而且意味着反思好的生活和好的社会到底意味着什么。

在战败后的一段时期，处于社会最高层的许多人士，并未表现出对社会公益的任何热忱。取而代之，他们将注意力集中于如何通过大规模掠夺囤积军用储备和公众资源使自己发财致富。充斥战时宣传与行动的有关种族及社会团结的秘诀，似乎一夜之间消失殆尽。警探们对于这种猖狂聚敛个人财富的奇观痛心疾首（当然不是在他们自己受贿和敛财的时候），而普通百姓也对昔日领导者和同胞们的腐败堕落深表厌恶。甚至早在胜利者进入日本之前，战败的心理就已经深刻地改变了人们的所思所为。²⁶

正是在这种变动不安的氛围中，美国人开始着手拆除帝制政府的统治压迫。新的空白留待被征服者们自己动手填补，而他们也往往以出乎意料的方式加以完成。对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构想的支持之众，超乎美国人的想象，而新兴的劳工运动也爆发出了惊人的活力。中层官僚成为重大改革的倡导者。妓女和黑市商贩创造了独特的、颠覆旧习的战败文化。出版界的反应则是对文字的如饥似渴：出现了从廉价劣质读物到锐意批判的书刊，乃至大批西方译著等全方位的出版物。“爱”、“文化”等音义复合的新概念，成为街谈巷议的对象，而形容词“新的”，几乎

被混乱地用于修饰每个触目所及的词汇。私人情谊，取代了旧的国家对公众道德的强制命令。颓废派的艺术鉴赏家应运而生，成为广受欢迎的、对战时所谓“健全”文艺潮流的批判者。新的英雄被发现和神化，新的名人迅速获得大众文化的爱戴。以救世主自居的各种宗教大繁荣，而王位的觊觎者也出现了。成千上万的普通人，在团体集会上、在给刊物的来稿中，或是像雪片般飞来的写给占领军当局的通信中，大胆表述自己的见解。数千万人发现自己正渴望着像他们的美国领主那样，理所当然地享受富足的物质生活。

这一切混乱不堪。这一切也充满活力并且释放压抑。在最初的数年间，即使共产主义者也会发现，很容易将占领军当作“解放军”来看待。然而，就像战败的日本人的活力被低估一样，占领者的“美国化”实质，也通常被过分简单化了。战胜者引入的改革，对于日美两国来说都是不合时宜的。它们反映出被美国的新政姿态、以劳工运动为基础的社会改良主义与权利法案的理想主义所严重浸染的构想，而这种倾向在美国本土正处于被否定或者受忽视的过程之中。此种构想从未被引入美国在亚洲的其他占领区域，譬如南朝鲜、日本本土南端的冲绳以及琉球群岛。在那些地方，严酷的战略考虑占了上风。此外，即便是在早期最

27 富于理想主义色彩的阶段，占领者的“美国化”也是矛盾分歧的。而且这种“民主化”的构想，即便是在独裁统治严重的美国国内提出，看来也过于极端。

我们通常认为，1945年8月，是区分军国主义的日本与一个新的民主国家的标志。这一时刻是一个分水岭，但是日本从1930年代直到1952年，持续处于彻底的军事政体统治之下也是事实。尽管可以更宽宏大量些，但是麦克阿瑟将军和他的司令部，就像是新殖民主义的霸主统治着他们的新领地。如同天皇及其臣僚们过去所做的那样，他们丝毫未受到挑战或是批判。他们集中体现了所谓的等级制度——不仅是对被战败的敌人，而且甚至是在他们自己严格的等级体制内部，同时还遵循着所谓白人的规则。占领方式一个最致命的问题是，受日本帝国掠夺迫害最为灾难深重的各国人民——中国人、朝鲜人、印度尼西亚人和菲律宾人，在这块战败的土地上，既不会被认真对待，也没有任何有影响力的存在。他们成了隐形人。亚洲各国为打败日本天皇的陆海军所做出的贡

献，由于对美国在“太平洋战争”中胜利的强烈关注而被忽略不计。按照同样的逻辑，日本在殖民和战争中对亚洲人民犯下的罪行，就更容易被抛诸脑后了。

由于胜利者不具有语言或文化上的沟通途径进入战败者的社会，他们除了通过现存的政府机关实行“间接统治”之外别无选择。这是不可避免的。然而真正实施起来，这种间接统治导致了某些不和谐的发展。实际上，麦克阿瑟将军的“垂帘听政”，依赖于日本的官僚机构贯彻指令，从而产生了一个双层的官僚体系。当美国人离去之时，本国的官僚集团延续下来，甚至比战时还要强大。为了意识形态的目的，麦克阿瑟也选择了依靠裕仁天皇，而在天皇的名义之下，整个亚洲都曾被野蛮践踏。麦克阿瑟甚至走得更远，他私下劝阻了天皇裕仁身边的随员要求天皇退位的质询，而且公开赞扬天皇裕仁是新民主的领导者。

麦克阿瑟将军及其亲密助手，果断决定为天皇免除所有的战争责任，甚至免除了允许以他的名义发动残暴战争的道义责任，这种美国人的保皇主义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天皇对其国家的侵略行为的积极作用，是无法被忽略的，尽管占领者阻止了对此进行的严肃调查。无论如何，²⁸ 天皇的道义责任是无法推卸的，而美国人选择不是忽略而是否认这一点，近乎是将整个“战争责任”问题变成了一个笑话。假使一个以其名义处理日本帝国外交和军政长达二十年之久的人，都不为发动和领导这场战争负起应有责任的话，那么，还怎么能指望普通老百姓费心思量这些事情，或者严肃地思考他们自己的个人责任呢？

这样的决定与行为衍生的后果不胜枚举。胜利者自身的做法，导致了这种自相矛盾的处置方法的制度化，例如所谓“官僚制民主”与“天皇制民主”的产生。同时，与对待天皇的谄媚态度相一致，同盟国对一小撮犯下战争罪行的日本高层军事、文职领导人，也采取了奇妙的处理方式，由在东京的胜利者们进行了一场作秀式的审判。此举强烈助长了一种大众倾向：无视大和民族在领土扩张与国家安全的狂热追求之下，对其他国家和民族所犯下的罪行。占领期过后，外国人将这些情形作为日本具有某种倾向性的证据，他们暗示说，战胜者理想主义的构想在这些领域失败了。事实上，这些现象尽管特殊，却是由日美两国共同作用产生的。许多今日日本社会的核心问题——其民主的本质、民众关于反

战主义与重整军备的强烈情绪、战争被记忆和遗忘的方式——都得自战胜者和战败者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

对许多日本人而言，倘加以回顾，紧随战败之后的那几年，的确构成了一个不同寻常的混乱而充满生机的年代。当时，对美国式政治模式的采纳，看上去似乎比国家主导的资本主义更有希望，至少人们可以梦想未来日本将会在国际上占据一席之地，而不是在美国的核保护伞下悄悄地重新进行军备扩张。往日的苦难往往能勾起回忆，而有时怀旧的感伤会使回忆变得甜蜜。近些年来，这种个人记忆被日本国内丝毫未有衰退迹象的出版热潮所支撑。书籍、文章、期刊专号，持续不断地从任意可能的角度言说战败与占领时期的经历，形式包括政策文件辑录、全方位开掘的学术研究、日记、回忆录、信件、新闻记录、照片以至逐日的纪事年表。许多战后时期成名的社会名流现在才刚刚谢世；而他们每一位的离去，往往会唤起对那个年代尖锐痛楚的记忆，虽然渐行渐远，却仍然与现实息息相关。试图掌握和分享这些是一项令人畏惧的任务，大致说来，是因为总有如此之多可以讲述，当然也有如此之多可供学习。

日本的某些特质使人们乐于封闭地看待它，而战后的密闭空间，也极易使人将其夸张地视为“典型的”独特的日本经验。不仅是外来者倾向于孤立和隔离日本的经验，其实没有人比日本国内的文化本质主义者和新民族主义者，对国民性与民族经验假定的独特性更为盲目崇拜了。甚至是在刚刚过去的 1980 年代，当日本作为全球资本主义的主宰出现时，也是其“日本”经验的独特性，在日本国内外吸引了最多的注意。尽管所有的族群和文化都会通过强调差异区分自我、也被他者所区分，但是当论及日本的时候，这种倾向被发挥到了极致。

当然，战败后的几年，确乎构成了一个逾常的历史时刻。然而，正像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曾经描述过的宗教体验那样，在极端的困境中往往才能最好地暴露事物的本质。我发现了有关这个国家重新起步的不寻常经历的确切细节和脉络，但是它们打动我，并非由于它们是外国的、充满异国情调的，甚至也不是作为日本历史或者日美关系中有教益的插曲而使我动心。相反，在我看来最吸引人的却是，战败与被占领迫使日本人尽全力去奋斗，以异常艰苦的方式来解决最基本的人生问题，并由此反映出令人瞩目的人性的、易犯错误的、甚至往往是充

满矛盾挣扎的行为方式。而这些能够告诉我们有关我们自身与我们这个世界的许多普遍讯息。

例如，绝大多数日本人能够轻易抛弃十五年之久的极端的军国主义教化，这为我们在二十世纪的其他极权主义政体崩溃中所看到的社会化的限制与意识形态的脆弱提供了教训。（众多王室被推翻而日本君主政体屹立不倒，在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这本身就是一个富于启示意义的题材。）再譬如美国的越战老兵，如果了解到天皇的士兵战败归国后是如何努力向普遍遭遇的鄙夷蔑视让步的话，定会感到一种熟悉的震惊。同样，对自身苦难先入为主的成见，使得绝大多数日本人忽视了他们对他人造成的伤害。这一事实有助于阐明，受害者意识是通过何种方式扭曲了集团和族群为自身建构起来的身份认同。对于战争罪恶的历史健忘症，在日本自有其特定的形式，但是将之置于一个更为广阔的、有关群体记忆与神话制造的背景中来进行观照，其记忆和遗忘的模式则更加寓意深长。近年来，这些问题理所当然地引起了广泛关注。在战败与战后重建的混乱环境里，“责任”常常被提及，因而这并非只是日本这个岛国所关心的问题。³⁰

当日本人在他们的历史中仔细搜求，以便为他们的“新”情况作参照的时候，譬如本土的民主政治基础、有原则地反抗军国主义的事例，或者固有的忏悔和赎罪的表示等等，他们提出的例证自然是千真万确。然而他们所做的，不过是任何人在面对创伤性的巨变时都会去做的。他们在发现——如果需要，甚至发明——某些可以依赖的熟悉的经验。日常语言本身就是一座桥梁，使许多人不必完全经历心理混乱，就能够由战争状态跨越到和平的彼岸。因为许多战时的神圣词汇、标语口号，甚至是流行小说，在战后被证明可以完美地适应全新的阐释或者指代完全不同的客体。再者，将熟悉的语汇赋予新的意义，也是人们将实实在在的变化合理化与合法化的一种方式。

当然，人还可以由这些“桥梁”走回去，重蹈过去的覆辙。在当今的日本，新的民族主义者的叫喊甚嚣尘上，他们中最狂热的分子，也恰好瞄准了我们这里所讨论的年代。他们将日本战败后的美军占领时期，描述为一个压倒性的耻辱时期，当时真正自由的选择被压制，而外国模式被强加于日本人民头上。我个人对于那个时代的活力以及日本在战后

思想意识形成中的推动力的估计，则更为积极一些（尽管留有余地）。真正重要的，是看此后日本人如何对待自己的战败经历。半个世纪以来，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始终如一地将其作为检验信守“和平与民主”承诺的准绳。“和平与民主”，是战后日本最伟大的祈祷语。“和平与民主”，也是今天的人们各自塞进迥乎不同的意图，并且持续争论下去的护身符式的口号；而在迈向“和平与民主”的奋斗中，无论观念论争，还是沉重的历史记忆，都不是日本所独有的。

注释：

- 1 引自 George Sansom, *The Western World and Japan* (New York: Knopf, 1965), p. 407。
- 2 名义上，对战败国的占领由所有战胜国共同实施。有两个国际组织行使顾问权：一是由 11 国组成设于华盛顿的“远东委员会”；二是设于东京的 4 国“对日理事会”。麦克阿瑟将军的正式头衔是盟军最高司令官。实际上，对日本的占领由美国操纵。
- 3 笔者在这里尽可能避免重复业已在早期著述中讨论过的论题，这些著述包括以下相关著作：*Empire and Aftermath: Yoshida Shigeru and the Japanese Experience, 1878—1954* (Cambridge: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1979); *War Without Mercy: Race and Power in the Pacific War* (New York: Pantheon, 1986)；以及 *Japan in War and Peace: Selected Essays* (New York: The New Press, 1993)。在最后一本文集中，对战争遗产问题的专门探讨，请参见“*The Useful War*”一文；有关美方最高层的战略计划，参见“*Occupied Japan and the Cold War in Asia*”；美日关系的种族与心理维度，参见“*Race, Language, and War in Two Cultures*”与“*Fear and Prejudice in U. S.-Japan Relations*”；有关漫画的研究，参见“*Graphic Selves/Graphic Others*”；有关日本保守派传统，参见“*Yoshida in the Scales of History*”。关于占领的遗产问题，在“*Peace and Democracy in Two Systems: External Policy and Internal Conflict*”一文中有所阐述，参见 Andrew Gordon 编, *Postwar Japan as Histo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pp. 3–33。
- 4 1945 年 9 月 4 日日本内务省的一份机密情报报告，着重强调了美国人以下的性格特征（关键词皆以英语标示）：(1) Practical, businesslike (实际、务实)；(2) Straight-forwardness (坦率)；(3) Speedy action (行动迅速)；(4) Self-conceited mind (自负)；(5) Adventurous spirit (富有冒险精神)；(6) Punctuality (守时)；(7) Vulgarity (粗俗)。此报告收入粟屋宪太郎编《资料·日本现代史 第二卷 败战直后的政治与社会》(东京：大月书店, 1980), pp. 313–317。“投降预备计划”在日本实际上是不存在的，直到最终时刻，甚至连谈论战败的可能性都是叛逆不忠的行为。与此相反，在美国方面，这样的计划在日本投降前几年就已经详细制定出来。参与者如 Hugh Borton, 以及 Marlene Mayo, Akira Iriye 和 Robert Ward 等学者，这些年来对此问题都有颇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发表。

EMBRACING DEFEAT: Japan In The Wake
Of World War II by John W. Dower Copyright
© 1999 by John W. Dower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Georges Borchardt, Inc.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8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

ALL RIGHTS RESERVED

本 PDF 电子书制作者：

阿拉伯的海伦娜

爱问共享资料首页：

<http://iask.sina.com.cn/u/1644200877>

内有大量制作精美的电子书籍!!!

完全免费下载!

进入首页，点击“她的资料”，你就会进入一个令
你惊叹的书的海洋！

当然，下载完了你理想的书籍以后，如果你能留言，
那我将荣幸之至！